

皖南事变中叶挺军长被扣以后，先关押在李村（上饶南郊）。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了拉拢他，三日一小宴、五日一大宴，但叶军长自始至终抗议国民党方面制造事端，要求释放新四军官兵。顾祝同无计可施，把他关进盘石渡的第三战区军法执行监部的看守所。

在李村关押期间，我和新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黄诚、组织部长李子芳、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等人，还有参谋处长赵凌波（叛徒），都关在与叶军长相距不远的地方。我开始并不知道和军长仅相隔一层墙壁。一天晚上，我唱歌解闷。军长听出了我这特有的沙哑嗓子，于是在邻室高呼：“林植夫你好吗？”我听出是军长的声音，便也高声问道：“军长好吗？”不料，立即被看守的宪兵制止了。

我被关的室外是一长方形院子，通过院墙的缝隙可以看到邻院内的情况。有一天，我乘宪兵不在，向邻院窥视，发现军长正蹲在院内煮东西。我提高嗓子咳嗽两

声，军长发现了我，突然跑过来，从墙孔中递给我一支好香烟。我连忙接着，彼此相对一笑，立即走开。一瞥之间，我发现军长的须发很长，后来听说是他拒绝理发而留长的，且发誓不获自由，不剃胡须。于是我也发誓不见到延安的人，不剃胡须。

担负看管军长的那个国民党兵，是被拉伕拉来的老百姓。后来我们对他做了一些工作，常为我们暗中传递信息。看守我们的宪兵中，也有为我们传递消息的。

我们被关到盘石渡后，开始也不知道是和军长在一起，是在上厕所时偶然发觉的。原来我们两边的厕所，中间只隔一堵矮墙。当时，我同冯达飞、吴正邦、余亚禄等关在一起，而余已有降敌的表示。因此我与另两人商定，不论何人听到军长到厕所的声音，彼此先递暗号，吴便去监视余，冯设法分散宪兵的注意力，我则去厕所

交与我们三人各持一份，并嘱咐说：“你们三人中应可能有一个活着，希望把我的遗嘱保存下来，看机会予以发表。”遗嘱的用纸是大拇指宽、两三寸长很薄的小纸条，内容大意是：“此去生死未卡，如有万一，妻儿子女，希望朋友们照拂……”我后来把它横卷起来缝到棉大衣的里子内予以保存。

军长走后，我们三人的关系发生了变故。有一天，联秘处（三战区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的简称）一个卢委员叫我们去谈话，吴正邦先被叫去。我进去时，看到他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，我开始看不起他。卢叫我写悔过书办自新手续，我不仅拒绝，还痛驳了他一顿，因此被认为“反动”。1942年4月底，我们被送进有名的上饶集中营；6月初，战事日紧，又将我们押离上饶。就在离开上饶的那天早晨，冯达飞被拉到茅家岭杀害了。在路过崇安赤石时，国民党又集体屠杀了被俘的新四军战士多人，仅我知道的就有男同志13名、女同志7名。

面对严酷的现实，吴正邦把叶军长的遗嘱毁掉了，并劝我也毁掉。我坚决不同意，对他说：“你放心好了，即使暴露出来，我也决不攀扯你。”他不知道我将遗嘱藏在何处，也只好作罢。

不久，负责看守的训育组组长刘治汉找我们谈话，吴正邦可能就是通过这次谈话叛变的。刘再次要我写悔过书自首，我说：“我之来到新四军，是依照中央合作抗战的国策，自问没有任何错误，既谈不到悔过，更无所谓自新不自新。”他见我态度坚决，二话不说，仍把我送回了看守所。这时我以为他们即将把我处决，回顾此生，在公的方面，舍家从事抗日，已历3年，总算尽了

叶挺军长的

□ 林植夫



与军长联络。这种方法，居然顺利延续到军长被押送走为止。在交往中，我们与军长既表示彼此的决心，也讨论时局，讨论苏德战争。军长还将友人从香港寄给他的贺年诗抄给我们，我们也都写了和诗送给军长。就在军长在被押走前夕，他写了同样内容的遗嘱一式三份

1950年11月，陈赓从越南回北京述职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完成援越抗法任务的情况。1951年4月，中央任命陈赓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

陈赓笑解彭总怒

□ 阎稚新

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率部入朝。6月，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，协助彭德怀主管作战指挥。1952年3月，陈赓回国休养康复，又回朝鲜前线，这是毛主席叫他替换彭总的，4月初，彭总奉召回国休养，把前方的一切职务都交陈赓代理。

其间，1951年6月下旬，志愿军党委召开作战会议。各兵团、各军及各兵种军政首长参加会议。陈赓副司令员在会上作了报告，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在阵地战初期，要采取“零敲牛皮糖”作战方针的指示。彭总在总结发言中，首先非常诚恳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说，第五次战役一是打得急了一些，二是口张得大了一些，三是打得远了一些。承担了指挥领导责任。当讲到六十军问题时，彭总勃然大怒！当场喊道：“韦杰、袁子钦来了没有？”六十军军长韦杰、政委袁子钦起立回答：“我们来了！”彭总说：“你们军长、政委是

怎么指挥的？把一个师都丢了，造成我军建军以来极少有的惨重损失！”彭总越讲越生气，忽然站起来说：

“郑其贵这个人怎么当师长的？作为一师之长，应该临危不惧，冷静镇定坚决地指挥部队，杀出一条路，突围出来。郑其贵这个怕死的胆小鬼，竟惊慌失措，耽误25日一个夜晚的宝贵时间，把一个师近万名战士都不要了，一个人跑回来了！这样的人不配当师长，不只是撤职，而且要查办，要按军法从事。我还要报告中央军委和毛主席，撤销一八〇师的番号。”彭总大发雷霆的讲话，会场的空气都凝聚了。当时，几位副司令都想缓和一下会议气氛，正在彭总气头上又不好直说。只有陈赓和彭总既有几十年的深厚友情，又是彭总和妻子浦安修之间的红娘。于是他走到彭总面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老总！开了大半天会了，大家动都不敢动一动，我看他们脸都憋红了，想出去小便都不敢，现在肚子又饿得不行了。你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一定也累了。我建议是不是休息一下？让大家小

自己的义务；在私的方面，儿女均已长成，也无愧于家庭；只是想起军长的遗嘱，心中非常难过。冯达飞已死，他所保存的那一份必不存在；吴正邦变节，又将遗嘱毁掉，更是令人痛心。现在只剩下我身边的一份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将它保全下来。举目四望，谁又能托孤寄命呢？最后想起睡在我身旁的王聿先，以他医生的专业，对三战区还是需用的人材，也许可望不死，并且他为人还较正派。遂辗转试探，他竟慨然应诺替我保全，我偷偷地把遗嘱交付与他了。不久，我发现反动派似无杀我之意，于是又向王聿先索还，他却说已交冯雪峰了。当时冯雪峰和林琼二人已由人作保脱险，我以为必定可以保全下来

了。

建国后，我曾向党中央和有关部门查问叶军长遗嘱，始知尚未见到。我托人问冯雪峰，他不知道；后又查得林琼在重庆，去函询问，复函也说不知道。一直到1950年5月，知道王聿先在上海任职，立即去函查问，才知道叶军长的遗嘱最后还是毁掉了。王的回信称：“……呈兄提及叶军长手示问题，在徐市禁闭室，先交给我后，即暗藏裤带内。出禁闭室后，即设法拟交冯雪峰同志，因他被保释医病，弟不便亲自交给，遂托特训班一位姓王的青年同志转交。解放后，曾问及雪峰同志，他说没收到。去年秋得晤王同志，他告诉我，当时因为病得糊里糊涂，没有交给雪峰，后来他丢到

厕所中去了。因为当时我曾告诉他，若交不到雪峰，可以烧掉，以免给敌人借口，对我们、对叶军长均是不利。”他还作了自责：“这事我应负责任的是应当交还给你，由你处理。”此信证实了叶军长的遗嘱确已被毁。我千方百计想要保全的东西，终告落空。假若原物保存下来，也是革命史上的一个宝贵文献，它将使人们知道叶军长对革命是如何坚决，如何忠诚。我深悔当日不该顾虑过多，竟使老一辈革命家的手泽湮灭，总是一件令人终生无法补偿的憾事啊！

（作者时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长）

责任编辑 葛苑生